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

王勇忠

内容提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金陵大学设立了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余人,因此对金大难民收容所的研究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多年来,由于资料的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依据新近发现的相关史料,对金大难民收容所作个案研究,以期加深对其的了解和认知,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金陵大学 难民收容所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总体来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嫌不足。在广度方面,以往研究多偏重于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即偏重于对加害者的研究,缺少对难民群体即受害者的关注。在深度方面,以往研究中宏观概述多于微观研究,而对各难民收容所的具体管理和其中的难民日常生活,以及参与安全区难民救济的中方人员的关注尚显不足。本文依据新近发现的相关史料^①,对金大难民收容所做

① 《金大难民收容所》表格资料,由笔者发现于南京大学图书馆报库(原金陵大学图书馆),油印本,24页,内容包括南京难民区地图、金大难民人数及年龄表(3份)、金大粥厂外来领粥者统计表、金大难民技能者统计表、金大难民寡居户口人数调查表、金大难民生产调查表、金大礼拜捐收支清单、金大难民收容所杂项开支帐单、金大难民收容所清洁工役津贴名单、金大难民自修团课程表、金大难民自修团教职员名单、金大难民自修团学生名单等。

个案研究,并力图展现安全区内各收容所的一般状况和难民的基本生活情况,以及关注参与难民救济的中方人士的日常生活,以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

—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燃起战火,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占领了北平、天津后,8月13日,又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迂回中国军队。11月12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全面西撤,日军疯狂追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南京遭到空前的浩劫!

在此之前,金陵大学被迫西迁,为保护学校资产,校长陈裕光委任历史系贝德士教授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名义留在南京^①,担任守护校产的重任。应变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史迈士(L. C. Smythe)、林查理(C. H. Riggs)、特里默(C. S. Trimmer)、陈嵘(Chen Yung)、齐兆昌(C. T. Gee)和顾俊人六人。^②此外,一齐留校的还有另外28名教职工,包括一些志愿者。11月20日,陈裕光在给贝德士的电文中说:

我已经同您简短地谈到了校园的形势和在就金陵大学离

① 1938年1月13日被金陵大学董事会正式任命为副校长。

② 贝德士、陈嵘、齐兆昌、顾俊人均为金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由于陈嵘曾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留学,后又到美国、德国进修,精通日语、英语和德语,在日本大使馆和宪兵司令部中都有一些认识的同学,因此在大屠杀期间,他曾陪同美籍教授和国际安全委员会委员多次前往日使馆和占领军司令部交涉,并致电帝国大学的老师,请求对其在华学生施加影响。

开南京时成立一个紧急委员会的事项。您乐意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吗? 委员会将由 4 位西方人和 4 名中国人组成。您可以从委员当中自主挑选一个小的执行委员会。除了这个委员会之外,还将有许多人留在校园里。一旦人员确定,就会给您一份名单。我想向您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明确地表示,在遇到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要求你们留守在校园里。我们也希望你们把生命的价值看得比保护和维持金陵大学的工厂更加重要。南京相对平静下来和进入恢复期,可能要经历数周的时间。对于你们在这段时间里给予的帮助与合作,我们深表感谢。我们明确地要求你们不要为了学校的大楼去冒任何生命危险。我如此坦诚相见,是想让您对我们的这种决定传递给委员会的其他人员。^①

12 月 4 日,在前往汉口途中的轮船上,陈裕光又致电格萨德:

他们负责这一时期定然出现的楼房与财产问题。我们感动地看到能有这么多的老职员,在这关键时刻愿意留在南京。我已经极力嘱咐他们不要冒个人危险去保护校舍,并将寄给贝德士博士的信函一并附上,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了类似的信件。我想让你们知道,在我们计划下一步的时候,这群人的精神对我们帮助很大。大家都竭尽全力地想让金陵大学早日开学并继续一如既往地服务于这个国家。^②

同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发起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在南京市内划定了“安全区”,设置了难民收容所。由于安全

① Y. G. Chen's letter to Dr. Bates, November 20, 1937, 原件存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0 页。

② Y. G. Chen's Letter to Dr. Garside, December 4, 1937.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第 292 页。

区国际委员会只有 22 名成员, 因此以留守的中国职员和家属, 及中国基督教徒组织为中心, 在各收容所分别建立饮食、居住、卫生等自主运行机制, 在各收容所所长的领导下对收容所实施管理。它们的存在, 在特定的恐怖环境中, 保护了难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了难民的生活必需, 揭露了日军的野蛮暴行, 伸张了人类的正义。

1937 年 12 月 8 日, 国际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 安全区正式开放, 最高时有 25 万难民涌入。区内分设 25 个难民收容所^①, 其中与金大相关的有金大蚕厂^②、金大图书馆^③、农科作物系^④、金大宿舍^⑤和金大附中五所^⑥, 由贝德士、陈嵘和金大宿舍收容所所长齐兆昌共同负责。收容所内每幢房子均有金大留守职员和选出的难民具体管理, 并且收集相关情况反映给国际委员会。除普通难民外, 居住在其中的“还有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 包括各高校留守人员 1000 多人、南京中小学生 5 万人中来不及逃走的数千人、上海和沪宁线各校师生尤其是教会学校师生数千人”^⑦, 以及随后由金女大转来的数千名女性难民。^⑧

① 双塘难民收容所虽然位于安全区外, 但也隶属于国际委员会管辖。而栖霞山难民收容所和由京特、辛德贝格在南京城外江南水泥厂厂区南北设立的一个面积很大的难民收容所, 也收容大量难民。

② 即金大蚕桑系, 位于金银街, 代理所长金哲桥(音译)。

③ 位于金大校外, 所长梁开纯(音译)。

④ 即金大农业专修科, 所长沈家禹。

⑤ 包括学生宿舍和主校园的其他部分。

⑥ 位于乾河沿, 所长姜正云。

⑦ 陈慕法:《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区的忠诚卫士陈嵘教授》,《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 8 期。据笔者对陈慕法先生的口述采访, 他当时听到这些学生难民在感谢陈嵘先生时, 向其透露他们曾参加过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后逃到南京, 住在收容所内, 大屠杀期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⑧ 如(12月17日)魏特琳走在三四百名妇女儿童的前头, 领着大家到金大, 就像抗议日军暴行的游行队伍。

1937 年 12 月 17 日, 国际委员会调查时, 金大蚕厂难民人数为 4000 人, 图书馆 2500 人, 农科作物系 1500 人, 金大(宿舍) 1000 人。1938 年 1 月初, 国际委员会委员米尔斯和福斯特对 21 座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人数和救济情况进行了检查, 其中蚕厂(1 月 4 日) 3304 人, 图书馆(1 月 5 日) 约 3000 人, 金陵大学(宿舍)(1 月 5 日) 7000 人, 大多为妇女和儿童。而在新发现的统计表中, 对难民人数则有更详细的记录, 包括对各住宿地难民数量和年龄分布进行的 3 次具体调查。

金大(宿舍) 难民收容所人数表

1937. 12. 20	1938. 2. 16	3. 25	3. 31	4. 13	4. 15	4. 30
8972(人)	3039	2347	2125	2170	2170	1900

资料来源: 金大难民人数及年龄表(3 份), 金大粥厂外来领粥者统计表。(1) 12 月 20 日的统计中 10 岁以下儿童不被计算在内; (2) 12 月 20 日的统计表中列出了教职员家属及校工和家属的人数, 分别为 30 人和 103 人; (3) 第 1、2、4 次调查包括难民的具体年龄和住宿地情况统计; (4) 不包括蚕厂、图书馆和农科作物系。

难民年龄分布表

(1937 年 12 月 20 日)

年龄	11-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70	71- 80	81- 90
百分比	20%	25%	23%	17%	9%	5%	1%	——

(1938 年 2 月 16 日、3 月 31 日)

年龄	1- 6	7- 12	13-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70	71- 80
百分比	20%	13%	24%	18%	14%	6%	4%	1%	——
百分比	15%	15%	30%	20%	11%	6%	2%	1%	——

由于国际委员会还要求各收容所查实那些“其丈夫或抚养人被日本人拉走, 并且没有被送回的妇女和其他人员的人数”, 所以

金大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也统计了这方面的情况。

金大难民寡居户口人数调查表

(1938年4月15日)

名别	妇孺难民		寡居难民		被拉夫难民	
户口及人数	户口	人数	户口	人数	户口	人数
	997	2170	38	146 ⁽¹⁾	38 ⁽²⁾	47
寡居户口百分数				15%		
被拉夫户口百分数						5%
附注: (1) 确知被日军杀死者有 7 人; (2) 内有 9 户每户被拉去 2 人						

据程瑞芳日记记载:“12月10日,金男大(指金大)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了棚子……12月18日,金大还有房子没有开,我们住不下,华(魏特琳)叫齐先生(齐兆昌)开一些房子,送些人到那边去了。”^①而到12月20日金大调查时,用于安置难民的处所已有新科学馆^②、农学院(西大楼)、体育馆、甲字到壬字宿舍、图书馆、女生宿舍(即 William House, 二层小楼)^③、农场及南庙^④、各住宅^⑤、浴室等 17 处。此后,随着难民的减少,在 2 月 16 日、3 月 31 日两次调查中,都仅剩有新科学馆、农学院、体育馆、戊字到壬字宿舍等 8 处仍有难民居住。而到 4 月底,在图书馆、蚕桑系、农专科居住的难民人数由原来的八九百人,降至“只有少数难民尚未迁出”。此外,金大礼堂(大礼堂和小礼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程瑞芳日记之一》,《民国档案》2004 年第 3 期。

② 即应用科学馆,位于北大楼之东、东大楼之北,共有 4 层。

③ 当时金大收容所在此为难民发放大米,国际救济委员会后改为在此办公。

④ 即金大园艺实验场和金大轧花厂。

⑤ 如贝德士、史迈士、威尔逊、米尔士、费吴生、林查理、麦卡伦和宋煦伯等人在大屠杀期间,就住在平仑巷 3 号金大教授卜凯的住宅中。

堂)还被国际委员会用来储存粮食和煤炭。^①

其中,图书馆中以居住女性难民为主,体育馆中则大多是男性,但很多难民是一家人一齐逃进来的,所以也有混住的情况。由于难民众多和地方有限,收容所规定每人只能携带少量随身物品,并且全部打地铺。后来的难民则只能在空地上搭棚子居住。据收容所职员毛德林回忆:“到难民区来的难民很多,金大将学生宿舍和教室、体育馆,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等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所有的床、桌椅等全部拆除以便容纳更多的人。但难民实在太多,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好在室外露宿。当时南京水电已全部停止,为了供应难民吃水,我们多方设法,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而人力取水,水量有限。大小便也是问题,只能找点芦席搭个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② 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对金大难民收容所的情况也有类似的描述:“楼内肮脏拥挤,卫生设施很差”、“许多难民生活在遍布整个辖区的草席棚和帐篷里。”^③

① “贮藏最多者为谷物,照当时情形,金陵大学礼堂实为贮藏此等谷物最适合之处所。当混乱之时,数百吨米之看守人,其责任固重,即地板所受此等米之压力,亦不轻也。汽油、马达油、衣服、鱼肝油及数万元之现金,在保存与处置方面,亦各发生问题。幸赖会中人之努力与诚实,本会得未受显著之损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民国档案》1997 年第 4 期。

② 高兴祖:《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陵大学的暴行》,《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学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

③ [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6 页。据当时的难民回忆:一个 10 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内曾住有 81 个人。平房外面的屋檐下,也到处都是人。因房内已满,连每层楼梯上晚间都要挤睡两三人。倪秀萍:《葛国华:湖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参见费仲兴、张连红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7 册)——幸存者调查口述(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10 页。

二

安全区内的难民除靠他们自己带来的食物和国际委员会拨付给各个难民收容所进行分发的米、面生活外^①,还可以向国际委员会特许的私商购买国民政府撤离前提供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穷人的膳食则由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负责管理的粥厂以低价提供。因此,金大收容所的难民除自己垒灶做饭或靠家人白天送进来的食物外,每天还可以两次(上午9点半、下午4点)到红卍字会设在金大的粥厂购买米粥(每碗3个铜板)。^②而贫困者还可凭收容所发放的白布条免费领取食物。金大收容所还向难民分发萝卜干和蚕豆,胆大的难民则在晚上到北极阁附近的菜地挖些白菜,然后在学校的操场上支上灶台,煮白菜汤给大家喝。^③但由于长期吃粥,许多人都出现了腹泻症状,金大的留守教职员也“一样骨瘦如柴”。

金大粥厂外来领粥者统计表

日 期	前 门		后 门		总 计	每户 约计	合 计	现住校 内人数
	上 午	下 午	上 午	下 午				
3 25	399 户	180 户	800 户	425 户	1804 户	3 口	5412 口	2347 口
4 13	370 户	160 户	646 户	650 户	1826 户	3 口	5478 口	2170 口
4 30	202 户	118 户	395 户	180 户	895 户	3 口	2685 口	1900 口

① (1938年1月4日)农业专修科一袋(一担)米可分成满满的250香烟听(每听约一杯),每个成人一天得到一听米,儿童得到半听。有钱或者自己有米的、做买卖或吸烟的,均不能配给大米。每个家庭自己做饭。蚕桑系的难民每2人每天得到1升米。金陵中学除少数销售外,每天向穷人和一无所有的人免费发放10袋大米。图书馆的难民由大学粥厂供给膳食。参见《拉贝日记》,第351-354页。

② 由周庆兴(音译)领导,初由国际委员会提供大米,后转由红卍字会提供,并取得全部收入。

③ 倪秀萍:《葛国华:湖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除食物外,国际委员会还提供棉花和布供难民做被子。此外,还发放了相当数量的救济基金,“从开始工作到 1938 年 4 月 30 日止,发至难民手中的救济款达 251900 余美元,相当于平均城里每人 1 美金,或是难民营中每人 5 美金的救济”。^①同时,金大收容所还雇用了一些难民协助工作,并组织有技能的难民进行生产,如春耕、织布、被褥衣物的准备等,以此作为工作救济来帮助难民。国际委员会还举办各种工赈,如拨款 1500 元补助金大图书馆土木,又抽调难民百名帮助金大各农场进行春耕。“为抽调难民利用本校空地生产粮食起见,在难民区内选择能够从事耕种之难民 100 名。将以上难民由本校分配于城内外空地指使春耕,每日每名由国际救济委员会发给国币三角、米一升,凡遇雨天不能工作者,仅发米一升。以上春耕期间以四月一日至六月末日为止,所需一切农具、房屋等由本校设法供给”。^②

金大难民技能者统计表

(1938 年 4 月 25 日)

种类	织布	织手布	织机	纺纱	织洋机	编藤器	全能者	总计
人数	8	18	14	266	23	1	1	331
百分数	3%	6%	4%	80%	7%	——	——	

金大难民收容所清洁工役津贴名单

姓名	刘炳庄	唐士有	王林生	徐槐玉	洪起隆	张松海	刘世鸿	柳松文	陈费氏	刘田氏	郭王氏	刘贵珍	傅子珍	王刘氏等	林卜氏等	张树波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津贴	10元	10元	10元	10元	10元	10元	10元	10元	4元	4元	4元	4元	4元	4元	4元	10元

附注:本校工役不计在内

① 《金陵大学校刊》第 243 期,1938 年 12 月 5、19 日,转引自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9 页。

② 《本校办工赈向国际委员会提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六四九(157)。

由于金大收容所内住有大量的女性难民,所以还有孕妇生育的情况。金大难民生产调查表(1938年2月11日)就记录了包括家长姓名、原住地址、现住地址、生产日期、婴儿性别、小产存否、小孩现有几周、乳娘补救办法、乳娘有余否、生产死亡日期等10项,共44名孕妇的情况。这些产妇多被安置在图书馆和东楼(理学院),两地各有15人。在小产的6名孕妇中,2人的婴儿在出生后不久就不幸夭折,而存活下来的婴儿最小的仅有2天,最大的也不过3个多月。由于生活困苦,导致绝大多数产妇乳汁不足,只能以粥为补救办法来喂养婴儿,因此,“难民区里的很多小孩都慢慢死去,被用箱子成箱成箱的运走”。^①这种情形直到“(1938年)二月二号,上海来了许多鱼肝油,给难民小孩吃的,也有奶粉,为婴儿吃的”^②之后,才有所改观。曾夫人是金女大难民营卫生组组长,负责给婴儿孩子发牛奶、鱼肝油的工作。营养不良的孩子每天都可得到这种额外的食品,小组的三名助手除分发牛奶外,还负责调配牛奶。戴赖三夫人和曾夫人也负责其他难民营的发放,她们经常去视察其他难民营,组织发放工作。

局势逐渐稳定之后,金大收容所还为难民们“开设了四门指导课,在农业专修科学校办了一所小学,在蚕厂大楼办了一所农民学校,在 Severance Hall(北大楼)办了汉语、英语、日语和数学课程班,还在鼓楼教堂为老年人办了识字学校”。^③

其中,在北大楼举办的金大难民自修团“由陈嵘博士组织课程

① 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9册)——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7版,第1510页。

② 《程瑞芳日记之三》,《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

③ 史德蔚日记(1938年12月12日),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的教学管理工作”。^①按照课程表(1938 年 3 月 29 日),课程安排从周一到周六,每课时为 1 小时。上午从 7 点到 12 点,下午从 1 点到 5 点,休息 1 个半小时后继续上课,直到晚上 8 点全部课程结束。每天的课程基本相同,包括女子体育、高级算术/男子体育、高级日语、特高中初级英语/中级日语、初级日语、高中初级国语(每天 2 节)、唱诗/查经^②/劳作(每天一门,每周循环 2 次)、音乐、初级算术/圣经研究会。在周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间还安排有联合礼拜。参加自修团的难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课程,到农学院 109 号报名,然后到指定的教室上课:联合礼拜、查经、唱诗在理学院大礼堂,初级英语在理学院 B10 号,中级英语在理学院 B11 号,高级英语在文学院(北大楼) AB9 号,其余各班均在农学院 201、202 号。自修团的教师中除陈嵘、齐兆昌、顾俊人这样收容所的管理者外,很多是难民,其中姜本信、杨柏舟、居晴初等同时还作为学生选修了所开设的高级课程。由于缺席者没有被包括在内,这份学生名单只记录了 235 人的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和所选课程三项。从中可以看出,学生的年龄大多在 7—18 岁之间,其中 10 岁以下儿童所选的课程多为初级国语、初级算术和游戏三门,年龄稍大者则多选择高级国语、初、中级英语和初级日语等课程。

① [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9 页。其中提到金大“现在有九百多名学生在学习。”

② “这个星期,贝德士令人吃惊地让齐叫大学查经班开始上课。今天上午 9:00,陈勇(陈嵘)开始上了一课。”史迈士致家人函(1938 年 1 月 2 日),《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第 321 页。

金大难民自修团教职员名单

姓名	课程	性别	津贴
陈宗一	日语	男	义务
齐兆昌		男	义务
陶鸣白		男	义务
顾俊人	英语	男	义务
吴浩玉	英语	男	义务
毛德林		男	义务
孙树蕃		男	义务
杨世铭		男	义务
徐振之		男	义务
何汉三		男	义务
韩煦元		男	义务
章树东		男	义务
任 侠		男	义务
邵静贞 ^①	宗教	女	义务
朱善嘉	国语算数	女	17 元
朱立严	国语	女	17 元
杨善言	国语算数	女	17 元
罗明珠	女子体育	女	5 元
何才荫	音乐	女	12 元
李惠兰	日语	女	12 元

① 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负责人之一。

姓名	课程	性别	津贴
姜本信 ^①	音乐	男	义务
居晴初 ^②		男	20 元
万人安		男	20 元
陈君骅 ^③		男	6 元
胡忠怀		男	10 元
洪坤山	音乐	男	6 元
王铭三	算数	男	12 元
林逸人	国语	男	12 元
杨柏舟	男子体育	男	5 元
章勉之	算数英语	男	12 元
胡廷杰	日语	男	12 元
马 骥	宗教	男	义务
傅思德	宗教	男	义务
戴籛三夫人	宗教	女	义务

- ① 据对其子姜克任的口述采访,姜本信 1923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时任南京汇文女中(现人民中学)教务主任,其长子姜克强也是自修团的学生。当时他的父母、妻子、子女全部留在南京,住在汇文女中内,他本人一次在小粉桥差点被日本兵刺死。
- ② 居晴初在抗战胜利后参加了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证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 ③ 据陈嵘之子陈振树回忆,陈君骅以前在扬州教会工作,后逃到南京,住进收容所,抗战胜利后留在金陵中学教务处工作。王铭三是金大森林系职员,曾帮助陈嵘整理《中国树木分类学》,后在夫子庙开了家书店。林逸人、杨柏舟也是陈嵘的浙江老乡,投奔陈嵘,共同在收容所协助工作。

金大中方留守职员名单(已知)

姓名	别称	年龄	籍贯	学历	经历	职务	住址	薪金
陈嵘	宗一	44	浙江吉安	哈佛大学硕士	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	森林系主任兼教授	浙江湖州晓墅镇三社村	290 (元)
齐兆昌 ^①		45	浙江杭州	北俄亥俄大学土木工程学士	湖南沅江种福院测量队队长、江西牯岭工程局工程师、美国波斯登爱佛拉建筑公司副工程师等职	工程处兼校产管理处主任	杭州严官巷 11 号	290
陶鸣白		49	江宁	上海民国大学法学系	汉口特别区秘书等职	事务处事务员	南京仓巷街 31 号	105
顾俊人	竞成	25	浙江上虞	嘉兴秀州中学毕业		事务处事务员	嘉兴秀州中学	58
吴浩玉		25	江阴	嘉兴秀州中学毕业		工程处助理员		28
毛德林		30	江宁			工程处助理员	南京双塘 23 号	51
孙树藩	汉屏	37	江宁	本校文学士		理学院院长室秘书	南京新桥牌楼口 28 号	120
杨世铭	新民		江宁	本校医预科毕业		化学系助理员	南京虹桥 33 号	75
徐振之		38	江宁	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		图书馆流通部助理员	南京吉祥村	58
何汉三		40	江宁	江苏陆军中学毕业	军署书记	图书馆中文编目助理员	南京铁汤池巷	62
韩煦元		33	无锡	南京师范附中毕业		阅览部典藏组中文编目助理员	南京国府东街 15 号	45
章树东		37	江宁	江苏一中肄业	南京中学书记	中国文学系助理员	南门信府河 75 号	33
任侠		39	江阴	农业专修科毕业		农艺系助理员	无锡北周庄永裕号	63
邵德馨	仲香			本校毕业	芜湖华文中学	农业经济系教授		

① 从小被教会资助,毕业于教会之江大学,后留美。出于宗教信仰和感恩心理,进入金大工作。参见《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的守护者——齐兆昌先生》,《金大校友通讯》2008 年第 39 期。

资料来源:《金大难民自修团教职员名单》,《金陵大学 1937 年度教职员名册》,二档六四九(137)。

之后,难民自修团改为金陵补习学校,后又改名为鼓楼中学。1942 年 8 月伪中央大学接收金大后,学校被迫迁往乾河沿金陵中学,改名同伦中学,由陈嵘任校长,齐兆昌为教务主任,此举不仅使一部分学生得以继续学习,而且也帮助留校职工维持了生计。^①

金大礼拜捐收支清单(1938 年 7 月 8 日)详细记录了自 2 月 27 日到 5 月 29 日间收到的 15 笔捐款,共计 25.72 元。其中的 13 笔都为居晴初捐献,每笔 1—2 元,另外的 2 笔是音乐班押金费 1.50 元和圣道初偕书费 1.43 元。而支出方面包括邵小姐(邵静贞)介绍洪坤山弹琴(2 元)、邵小姐班上学生用书 50 本(2.5 元)、自修团修学证书及图章 1 枚(3.5 元)、买粽子(2 元,难民送女大时充饿)、卫生组菜费(1.4 元)、杨牧师车费(0.07 元)、复活节邵小姐发红绿蛋(2.7 元),其余则全被用作救济 12 位女性难民。除最初两次每人只收到 0.2 元外,随后几次(多在 5 月)每人大都收到 1 元,并且这些难民都有各自的介绍人,如陈嵘介绍邵怀德、冷朱氏,齐兆昌介绍郭子桃、高赵氏等。支出的日期从 3 月 6 日到 7 月 5 日,共计 25.72 元,达到了收支平衡。金大难民收容所杂项开支帐单(1938 年 10 月 27 日)则列有维持收容所运作的一些基本收支。其中,收方有“国际委员会于新年时赠本所同人酒菜之费”(60 元),支出包括送万人安君义务工作酬金(5 元)、送万人安君米一担(10.55 元)、买帐布(做难民条,3.8 元)、买扫帚 60 把(3.6 元)、买拭桌布(5.85 元)、送蒯先生义务工作礼品(5 元)、木椿(3.96 元)、臭水三听(1.2 元)、胡忠怀君于图书馆工作半月金(5 元)、铁

① 由于同伦中学规模有限,很多金大留守职员被迫留在伪中大继续工作,陈嵘和齐兆昌等人也在那里兼课。

丝及棕把(0.6元)、墨三铤铅笔25支、名册簿5本(1.5元)、修自行车及胶一瓶(0.8元)、墨水5瓶、印墨5瓶、纸夹报夹各1个(0.6元)、鸡毛帚4把(0.5元)、大竹把20把(4.2元)、印难民调查报告47份(4.7元)、茶点(3.14元)。日期从1月28日到9月28日,共计60元,也达到了收支平衡。这两份清单都由H. Y. Wu(吴浩玉)经手,Chao. T. Gee(齐兆昌)核对,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南京城内的物价水平。

三

南京陷落一周后,日本人就开始有计划的企图接管“安全区”。日本宪兵司令部不久便发表公告,将于12月24日向所有难民发放安民护照。人们必须到各发证所报到,领取证件,不允许代领,老、弱、病者也必须由家人陪同前来报到,没有安民护照的人一经查出将不允许居住在南京市内,并面临被枪毙的危险。登记由日本军队和南京特务机关执行。

金大难民收容所的登记自12月26日开始,在理学院进行。由于那里的难民较少,日军当局又把居住在图书馆的2000多名难民也弄了过来。因此,在理学院前的网球场上聚集了大约3000多人。日军长官开始训话:“凡当过兵或服过强制性劳役的(指军队夫役之类)都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这样主动站出来,可以保全你们性命,并且给以工作。否则一经检查发现,就要枪毙你们。”在日本军官的指示下,几名中国人(翻译)不断地重复着上面这些话,希望难民中尽可能多的人免遭像当过兵的或被诬告为当过兵的那些人所遭过的厄运。不仅索恩、里格斯、贝德士和许多金大的中国教工,而且福田、田中(日本使馆官员)也都清楚、完整地听到这些话。训话结束后,大约有200—300人站了出来,据其他难民回忆,站出

来的部分人是由于恐惧或是误解了“强迫劳工”一词的意思,因为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未当过兵。之后,日本士兵又从剩余的人中挑出了近1000人进行检查:一光头关,二手上老茧关,三肩膀上老茧关,四帽印子关,五卫生衣关。幸好,这些人排着队一个个地接受检查时,日军允许中国人为他们进行“担保”,因此,除一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参加了随后的登记。快到下午5时,这200—300人被分成两组,由日本宪兵带走。

几天后,日本兵又到金大收容所来抓俘虏,他们让难民到操场上集合,男人站在一边,女人站在另一边,然后开始认人。男的被叫出来,必须有人认领,才会放人。但是,有很多人都站在人群的后面,看不到被叫出来的人是不是自己的家人,所以又有很多男人都被日本人带走屠杀了。后来,日本兵害怕难民区里还有中国兵在里面,便在难民区里“演戏”,假装失败往外逃,好在老百姓没有发动起来,否则又有很多人要被屠杀了。

1938年1月7号,金大收容所恢复登记,负责登记的日本宪兵从面前经过的登记人中挑出了10个人带走。在此之后的一星期内,“从事这一工作的军官似乎得到命令每天必须抓那么多人,或者也许他们认为不少于这个数就能使他们的上级满意”^①,因此很多难民因为日军的这种随意的行为又遭受了厄运。

除这种集体暴行之外,居住在金大收容所的难民们仍面临着日军不间断的暴行!“在南京城内,佐尔格去了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区,看到日军成群结队地挺着枪刺冲进难民区,搜捕藏匿于难民中的中国军人、警察。抓到后便拖出人群殴打,五花大绑地押走,有反抗的则被当场刺死或开枪打死。日军还不顾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欧美籍人士的拦阻,掳走年

① 贝德士:《金陵大学难民登记的情况备忘录(1937年12月26日)》。

轻女子……”^①

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命运也同样悲惨!“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强奸,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亲属的面满足他们罪恶的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②为了抗议日军的种种暴行,贝德士根据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建议,“单独用文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反映日军在安全区内最大的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包括:日军一般官兵非法进入金大 1720 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强行拉走 647 人,凌辱妇女 290 人,以及 60 余起杀伤事件”。^③

“日军进入南京后,其强奸、掳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全南京城内,日军强奸妇女之案件,德国人估计在 2 万件以上。即仅就金陵大学校舍而言,难民之逃避该校中者约 3 万余人,强奸案当在 8000 起以上。有 11 岁少女与 53 岁老妇,亦未能幸免者。至于校内房屋及商店,殆无一家未被抢劫者;劫后往往以化学药物纵火焚烧。此种强奸行为,往往于白昼行之,并往往由军官领导为之!业经放弃武器与军服之华兵,以及一般难民,被日军任意枪杀者,触目皆是。”^④

总之,“全城民众之食粮与金钱即已尽为(日)兵士搜索而去,

① 王炳毅:《德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来历》,《档案与建设》2003 年第 9 期。

②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 年 1 月 15 日),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6 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 326 页。

③ [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毛良鸿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版,第 92 页。

④ 章开沅:《贝德士研究文献之一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 页。

彼等之被褥又同遭洗劫,不能避严寒之侵袭,大都已病不能兴……
街头巷尾闻涕泪相告,日军所到之处,无一人一室可获安全!”^①

结语

随着日军政策的改变和伪维新政府南京市政公署的成立,至 1938 年 5 月 7 日,安全区内仅剩金大、金女大、金中、男女神学院 5 处难民收容所,5 月底,这 5 所难民收容所也全部被迫关闭。1941 年,金大被日军接受,美籍教授或回国,或前往西迁成都的金大继续教书,而大部分中国职员则继续留守,直到 1945 年金大迁回南京。抗战胜利后,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三位教授因在“南京沦陷期间不避艰险,留居南京,举办难民安全区,救助难民,厥绩至伟”,于 1948 年元旦被国民政府各授“景星勋章”一枚,陈嵘、齐兆昌、顾俊人、史德蔚、史迈士等人也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南京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了 70 年,但 30 万遇难同胞和当时无数身受苦难的难民仍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正如南非开普敦大主教、1984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迪蒙·杜图(Desmond M. Tutu)所说:“如果我们试图忘却……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的健忘症而痛悔莫及,因为邪恶的过去是阴魂不散的。为促使作恶者认罪并寻求和解,有必要使人们了解发生在南京的事实真相。”

(作者王勇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02 页。